

孔范今 著

悖论与选择

• 明天出版社

BEILUN YU XUANZE

KONG FAN JIN ZHU · MINGTIAN CHUBANSHE

• 孔范今 著

悖论与选择

• 明天出版社

悖论与选择

鲁新登字 06 号

悖论与选择

孔范今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 插页 194 千字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42

ISBN7—5332—1475—7

I·312 定价: 4.05 元

自序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一束长短不齐的文字，大多是我近年来写的东西。其余的还有一些，但都没有收，因为虽然历时也并不久，但岁月业已洗掉了它们的价值，就连自己一看，也觉得陌生起来。

这些就都有价值么？其实也未必。但以经营文字为业的人，谁不珍爱自己那一点对于历史要求来说已经少得可怜的创作呢！我之所以还愿意把这些零散的东西奉献给读者诸君，是因为在我看来，在它们的零散之中却如一线串珠，贯穿着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特征的一个基本认识：悖论与选择。这也就是这个集子书名的由来。

大约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或许是有感于以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缺憾，也或许是出于一种不自量力的自我期待，我在心底里就萌生了一个难以自抑的强烈愿望，那就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走出条新路来。回首瞬间而逝的十年，庸庸碌碌，白白让时光滑过，只是徒生了许多感慨。若说没做事情，那也冤枉，十年来又读了些书，而且故意和过去的那个“自己”别着劲想了些问题，自觉还深有所得。至少，第一，我发现在文化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领域，而自世纪初以来，在新的文化理解里却又包含着极大的误解；第二，回到对象本体，应

该首先对其所属世界的全部历史景观有所了解，当我们以逻辑的形式发现了历史用全部的经纬线所编织成的结构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空前而奇妙的历史时空，它里面又含纳着多少真理性的启迪；第三，打通旧有文学史分期的时限，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按对象本身的要求看作一个历史过程，会使许多深在的因果关系漂移进显现层次，而历史运行轨迹及其背后机制也变得清晰可辨。当然，还有第四、第五……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统管这一切的那个基本历史特征：悖论与选择；而且我甚至十分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通向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命题！

这不是危言耸听。试想，上下五千年，有哪一个历史时段能像这段历史那样，充塞着那么多自我相关的矛盾，那么令人困惑和苦恼。什么价值判断与情感选择、文化启蒙与民族救亡、启蒙要求与文学独立等等，它们纵横交错地设置在历史运动的核心处，交迭穿插，相生相克，硬是成了一个步步难解的历史方程式。但是，历史只会严酷地考验历史行动的参与者，而它的运行却是不会因此而停滞的。历史不能假设，它的选择只能是现实的。这段历史在诸多因素的合力中所形成的内在机制，以及它的运动所显现出来的“自然法则”，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书中的文章，并不是正面解答这些问题的答卷。对上面一些问题的思考，在给学生们开设的有关课程中讲过也就算了，并没有及时整理发表出来。这些文章也大多是或任务压顶、或编辑们催债，临时赶写的。虽然写的时候或有意或无意，都融进了上面的思考，但到底是否有价值，也还只能是前边那句老话：其实也未必。好在我深信，我们的努力都没有停止，我们

都还有将来。将来应该更辉煌！

还要说明的是，书中《性爱：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确认》和《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后期现代派》两篇文章，当初是和郭德芳君、潘学清君合作发表的。

写下以上要交代的话，就算作自序吧。

1991年12月记于山东大学

目 录

自 序	(1)
面对历史的沉思	(1)
《鲁迅选集·小说散文卷》前言	(25)
认同求异与中国化过程中的新文化综合	(34)
鲁迅批孔：历史价值范畴里的符号选择	(45)
鲁迅小说价值简论	(66)
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后期现代派	(98)
对中国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的再评价	(117)
历史的补偿与当代意识的追寻	(137)
异端化观念与新时期文学的当代性	(155)
文学对创作主体的新选择	(162)
性爱：新时期文学在文化意识中的确认	(169)
漫话女性文学	(179)
文学的自我调节与超越	(186)
当代小说散议	(195)
两度轮回之后	(225)
诗歌王国里的寻找与创造	(229)

起点与路	(238)
孙国章《诗神与爱神》序	(243)
侯氏兄弟和《冻上集》.....	(246)
我读《通腿儿》.....	(250)
略论形象思维	(258)
寻找自己的世界	(271)

面对历史的沉思

——现代文学研究三议

富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学术研究，命定地摆脱不了困境，又命定地必须超越困境。

历时十年，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长时间前所未有的持续喷涌之后，一种失却自信的困顿感已油然而生。不论自命为“第四代”^①的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年轻人对独领风骚的“第三代”略带尖刻的诘难有多么幼稚，但他们作为自己已承受的历史前提，不无欢欣鼓舞而揭示出的“第三代”正面临的困境，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对此，以“自省”为群体特征之一的“第三代”也直言不讳，准确地说，倒是他们自己已更早地感受到了这种日渐迫近的危机。这班经受过“文革”磨难，从痛苦与失落中走来的莘莘学子，以超负荷的奋斗捕捉住了时代赋

^①这是二十几岁初涉学坛者的自称，他们大多是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他们把从建国前走来的老一代学者称为第一代，把五六十年代登上学坛的学者称为第二代。第三代是指“文革”后占领学坛且极为活跃的中年人，他们大多是“文革”后头几批招收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予的人生契机，又以超负荷的奋斗创建了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辉煌业绩。正是他们，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崭新命题，并从构成研究系统的观念模式上冲破了旧有格局，为现代文学研究向真理的逼近昭示了希望。然而，诚如中外一些历史前例所表明，愈是在开放性空间内获得相对自由的快速学术演进，愈是会较早地显现从事学术研究者个体、群体及其历史所提供的前提的先天性缺憾。置身于中外汇流的新的文化格局中，面对世界学术发展新趋势和中国“第四代”自以为获得了世界性特征的当代学术观念的双重参照，“第三代”的内虚感便不期然而生。他们虽然仍旧咬住既定的目标不放，并不惜牺牲自己承担历史重任的悲剧性心理体验自抚自慰，但由于对文化落差的自我感受，终不免因自己的研究难以取得新质的进展而自我怀疑，甚至对目标发生惶惑。这里面，固然有对某些非自律性社会条件的抱憾，而更多的却是因无法以既成的方式完成由社会历史批评向新审美批评^①的超度而产生的几乎一代人近乎宿命的情绪。他们不情愿接受这种现实，以为秉之于时代的使命仍非我莫属，而在历史与审美之间新的倾斜中又难以自持。

这无疑是一种敏锐而深刻的感受。它的价值在于以自省的方式接触到了历史为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所提供的一个基础性前提，即研究者知识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历史性局限。“第三代”是以传统的挑战者姿态崛起于学坛的。他们朝气蓬勃从人物评价或现象分析或思维方式的更变等各个角度向传统所发出的诘

^①审美批评中外均古已有之。此处所谓“新审美批评”的概括，泛指在西方新思潮影响下新近在我国崛起的以文学本体特征为认识对象的各种新的批评范式。

难，其真实命意无非是对传统研究范式及其一系列具体结论的反拨和矫正。廓清与重建的双重价值定位使他们的使命感并不亚于他们的任何一代前人。他们虽然对创造的永恒性价值梦寐以求，充满渴望；但更深知历史和真理都是一个过程，需要一代代人付出各自的代价，因此又以“过渡性”的一代自我确认。这种清醒的历史意识，使其心理深层的自我防卫意识和自审意识能够奇异地呈现为一种交参共存的基本和谐的状态，并外化为自信而又不失其谦和的治学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他们这种心态的是他们在新的建构中日渐感受到的困窘和迎面袭来的“当代性”挑战。在展现自己后如何再发展自己，这是任何一个或一代学人都要遭遇到的规律性难题。何况“第三代”是在知识的长期沉寂后应运而生、仓促的上阵者。在辨难和冲击传统的研究模式，改变旧有研究景观，揭示一个个带有自我印记的新发现的世界，从或一角度追寻历史发展的内在链条以及指示历史的缺憾方面，他们确实深刻警人，从容大度，而且理直气壮，不容置辩。可是一旦触及到深层更为复杂的历史矛盾，而又不得不用与传统相区别的全新的眼光加以科学的阐释，并建构具有完备意义的研究系统时，他们便隐隐感到了力不从心。他们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充裕的时间认真再多读一些书，但时不我待，竞相发展的学术形势容不得他们有一时的喘息。正当此时，偏偏又出现了“第四代”从“当代性”方面向他们提出的挑战，这就难免要生出一些内在的焦灼与不安了。

“第三代”的这种心境是已被大家感受到而且也是被理解的。这种情绪固然有可能动摇“第三代”人的自信心，但又未必不是一种实现新的超越的内驱力，因为危机恰恰是超越的前提。近一时期他们对研究方向选择、观念意识和把握方式的各

自不同的自我调整，就是很有力的说明。值得指出的倒是，在上述这一几乎趋于社会共识的问题里面，所隐含着的尚未被“第三代”和社会自觉意识到的自我误解和社会误解。误解来自对“当代性”的片面理解。其一，面对新审美批评的挑战，对社会历史批评尽管不乏现实性的价值肯定。但却缺乏预后性的自信。文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文学与历史相关性的永恒存在，决定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永恒存在价值。文学家的创造和接受者的再创造虽然有人类审美活动的独特规律，甚至这一领域的价值判断还会和历史的进展呈现二律背反状态，然而文学一切无序而又有序的现象的出现和消亡、发展和衰颓，究其根本又无不与社会历史内在的甚至外在的钳制有关。过去的失误只是在于，在这种批评范式内排除了对象本身内含的诸多参与因素，将批评者的眼光紧缩在社会政治的单一方面，而且无限贬抑了其他同样重要的批评范式，而把它推向独尊。对此种状况痛心疾首的反拨本是“第三代”事业展开的起点，而且正是他们筚路蓝缕不辞艰辛的努力，才使这一批评范式获得了科学性价值，并为其他批评范式的兴起和活跃开拓了广袤的空间。可是，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一批评范式理解和导引的偏狭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失误，而不能构成正常意义上的历时性特征，所以，当“第三代”起而反对它时，更多着眼的也就不是历时性问题，而是作为共时性因素的科学性的普遍原则。因此，无可讳言，虽然他们建树的事业已赢得当之无愧的时代特色，但在深层意识中，却对这一研究本身如何获取与世界文化发展相称的当代性，缺乏更主动的思考。他们对研究成果的先锋性怀有强烈的期待，但在咄咄逼人的新审美批评的挑战中却又缺乏足以支持自信的可靠心理保证，难免目光发生凌乱。应该

说，一阵大潮过后的分化是正常现象，“第三代”中一些人对研究视角的重新寻找也是一种必然，其中自有其非主体性逻辑展开的规律性原因。问题是无论是打算扬弃还是准备恪守社会历史批评范式的人都不要认为它已无法取得先锋性的品格，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恪守和扬弃都难以持久。“第三代”应从对其普遍原则的坚守（这在矫正历史失误方面十分必要）转到对其当代历史性特征的自觉思考与探索上来，尽早走出心理困境。

其二，是由主体关怀倾向而导致的对于历史研究“当代性”把握的非自觉性偏误。与在原则和具体材料中消融个性的研究方式不同，“第三代”把研究中科学价值的获得同时看作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他们更看重主体观念对研究对象的烛照和穿透，认为自身观念的调整是进入新的研究境界的首要条件。对象的历史性存在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着的只是一代代研究者的认识。面对着被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涂抹得面目已非的“历史”，面对着一连串深具迫切现实意义的历史研究课题，“第三代”出于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感，表现出一种怀有切肤之痛的醒目的主体关怀情绪。正如人类对其他事物的认识都不会停止在某一结论上一样，处在不同时空位置中的人们对现代文学对象及其构成的一段历史也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任何一个时期，人们的认识能力都会为这一研究及其方法论划定一个有效的范围；而后一时期较前一时期的改变又都必然形成对这一有效范围的突破。从这种意义上说，构成人类认识成果的“历史”，只是人类认识的一种成果，它的任何一种发展，都只能是认识者主体调整与发展的结果。尤其当一种错误的观念笼罩使主体失去了创造的活力，并由此使历史研究背离了基本的客观性要求或甚至陷入荒谬时，对主体生命活力的呼唤和对变更主体观念

模式的偏重，就不但是可以理解而且是应该给予高度历史评价的了。“第三代”的失误不在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主体关怀倾向，而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由此而不自觉陷入的另一种偏误，即对对象世界的相对漠视。在初登学坛的时候，他们本以恢复历史对象的客观规定性为己任，但随着对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和变革现实社会的广义实用目的的日益明朗与渴求，这一原初目的便于不知不觉间逐渐退隐。目的追求的悄然转移，带来的直接后果必定是对对象世界的逐渐疏离。他们重视的是“意义”的新发现，这原本不是什么错事。可是当对“意义”的理解在主客双构关系中只是偏于主体一方，当把目光从对对象世界的扫描内敛为只是对主体思辨的痛苦搜寻时，它的片面性便显现出来了。

尤应引起注意的是，历史提供给的缺憾性前提与这种片面性的连接，所会产生深刻危机。无可讳言，从第二代开始，包括第三代和第四代，他们所接触到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所接受的历史材料，都被限定在有限的认可范围之内，而并非历史对象的全貌或真貌。这种缺憾的造成，固然有历史偏见和极左思潮所构成的原因，另外有一个原因，即特定历史阶段对前此历史材料的合理性的片面选择，则是一种合规律的正常现象。由于这两种原因，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中，无疑应该包含着对这一前提的修补，即对对象世界的重新寻找。但遗憾的是，人们对此至今仍缺乏更为自觉的认识。不能说一点认识也没有，也不能说一点工作都没做，但这一切都仍局限在已知范围之内。应该说“第三代”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更多，但他们也只是在自己的选题范围内为搜求证据而有某些材料发现。明显的事实是，在新的研究格局之中，属于不同研究者的一个个

小世界各处林立。这虽属学术发展期的正常现象，但由它们连接起来的整体对象来看，显然还有不少构成对象世界或一方面的史实仍在他们已知知识范围之外。而且，由于对对象世界整体了解上的陌生，直接影响了某些论断的科学性。很难想象，与一个并不完整的对象世界，怎能进行更富有科学意义的对话。

弊端早已有所显现，而且迄未克服。对对象把握中的盲点导致观念认识中的误区，这是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偏误。近年来这种误区虽有日渐缩小之势，但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由于对四十年代小说发展状况了解的片面性，便得出了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向现实主义归依后现代主义在小说界已陷入沉寂的结论，就是明显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这时不仅在钱钟书，“七月”派某些作家的创作中含纳着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而且还有一个作家群仍然以现代主义为基本文学追求，这就是张爱玲、徐訏和无名氏等人。他们无论是对人类生存哲学的思考，还是艺术期待的实践展现，都足以说明现代主义是其基本的特色。与上一倾向相关，观念上的误解又会导致对对象世界的偏离。还举同一个例子。由于现代主义在四十年代小说创作中沉寂这一结论近于共识性的存在，人们便不能对已知的钱钟书创作作出符合本体意义的科学评析，对其隐藏在现实主义叙事态度中对“围城”人生主题思考的现代主义属性，也就大多予以忽视。对新近引入视野的张爱玲等人，对其创作倾向也只好作出其他牵强附会的比附，如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等等。

从历史研究的发展规律来说，它的当代性既包含着研究者认识能力的新发展，也包含着对史料的新发掘。两者应该是相

得益彰的。现代文学研究要走出新的困境，恐怕也要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而且给以同样的重视。从学科研究的本体意义和实际存在的某些倾向性而言，对后者进行更为自觉的认识尤为重要。有人提出，现代文学研究应回到文学本体，而我则以为尤为迫切的提倡却是回到对象本体，因为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包含双重的本体要求：文学审美特性和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承载与制约关系。同时，这一“对象”含有对对象世界的整体要求，它要求呈现的是在科学意义上反映整个现代文学历史景观的全貌。

二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及其变异性，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历史的帷幕一旦拉开，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丰富而瑰丽的世界。多种因素的共时并存和各种力量的积极参与，使它明显地呈现为一种活跃的复杂结构状态。意义显现于结构之中。对现代文学开展历史结构方面的研究，和带着自觉的结构意识研究现代文学的各种专题，应该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不能不指出，这是我们一向最为薄弱的环节。以新与旧、正与反两极对立的方式结构历史的基本骨架，加上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价值评估，这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基本研究套路。历史本身确实存在着正与反的对立，但它总是伴随着许多复杂的内容同时存在，甚至由于它们的牵制，呈现为扑朔迷离的局面。历史研究有责任对此加以说明。在审美领域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就更复杂了，很难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价值标准一概

论定。否则，不但科学价值会在伪科学原则中迷失，就是据以产生这种伪科学原则的直接性社会功利目的，也会在社会接受者的逆反心态中失落。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功绩之一，就是改变了这种名为二元构成实为单向度价值判断的构成模式，从许多方面恢复了历史构成的复杂性。可是从整体态势上来看，尚未在完备的意义上作出准确的描述；有人虽然力图重新解说这段历史，其中自然也内蕴着重新结构这段历史的热切企望，但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旧有的结构图式。

绵延数千年缓慢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流变几乎是一种同质的延展。朝代的更迭只是由一连串相类似的偶然事件区分，时序所显示出来的更多的是共时性特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这一历史规定中的特有心态。这种状况自近代起则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外力的强行干预虽然伴随着民族耻辱，以致造成中国人经久难消的心理矛盾，但由此而引发的历史大激荡，却显现了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在中外碰撞、新旧交搏中，封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土崩瓦解，新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艰难地崛起，破坏着一切旧有的秩序。自“五四”起，又有新的历史范畴出现，更加剧了各种矛盾的激化，并推动了新物的生长。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各种历史因素都空前活跃，各种结构秩序都发生着剧烈变动，构成了对前此历史共时性特征的破坏。努力抑制和破坏被认为民族灾难之源的历史共时性特征，是这一时代无比强烈的历史愿望。与以往历史不同，它把历时性特征推到了十分显豁的地位。对时代特点的这种确认，我的目的在于说明在这一大背景中演出着各种悲喜剧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结构方面会有多少历时性的重要特征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